

DOI: 10.13957/j.cnki.tcx.2019.06.024

近代醴陵瓷业自适应发展及其产教融合模式建构

邢鹏¹, 谭丽曼², 向超¹

(1. 景德镇陶瓷大学 档案馆,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2.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宣传部, 江西 景德镇 333001)

摘要: 近代醴陵瓷业的发展是在我国近代社会被迫转型的背景下主动发起的一次民族工业运动, 在战略上审势度时的采取了变轨式、错位式和结构式的发展理念, 在战术上采取了“厂校合一”、“以赛促销”的发展模式, 成功地将近代醴陵瓷业推向时代的高峰。其发展模式可谓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呼应了湖南士绅群体崛起与湖湘文化的再塑, 顺应了近代国内瓷业危局与醴陵窑工的变革心声, 满足了吏绅民商间的均利诉求, 成为了我国近代陶瓷业发展史上瓷业发展与教育完美结合的典型案例。

关键词: 醴陵瓷业; 瓷业教育; 瓷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TQ174.7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278(2019)06-0853-08

Mode Construction of Pre-modern Liling Ceramic Industry for Self-adaptation and School - Enterprise Integration

XING Peng¹, TAN Liman², XIANG Chao¹

(1. Archives Center,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 Jingdezhen 333403, Jiangxi, China; 2. Propaganda Department, Jiangxi Ceramic & Art Institute, Jingdezhen 333001, Jiangxi, China)

Abstract: The leap forward of Liling ceramic industry occurred as a part of the self-motivated national industrial movement in premodern China under the pressure of transformation. Strategically, the ceramic manufacturers changed their development track, relocated their enterprises and rationalized their structure. Tactically, they adopted the policies of school-enterprise integration and sales contesting. All these measures brought the premodern ceramic industry in Liling to its peak. Its development modes followed the trend of history,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the gentry in Hunan, helped shape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Xiangjiang drainage area, met the need for overcoming the crisis facing Chinese premodern ceramic industries, answered the call from the Liling potters fo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satisfied the merchants' demands for equal rights to profits. Liling ceramic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a representative case of ideal coope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schools.

Key words: Liling ceramic industry; ceramic education; ceramic industrial development

0 引言

如果说近代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彻底击碎了天朝上国的美梦的话, 那么《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则掀起了全国上下寻求“救国护种”良方的浪潮。迫于国内外严峻的局势, 清廷被迫发布施行“新政”,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和奖励办法, 在实业方面, 如《钦定大清商法》、《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

在教育方面, 如“壬寅癸卯学制”和“废科举兴学堂”等, 这些政策的颁布极大地调动了社会上下创办新式企业和新式教育的热情。在瓷业方面, 仅清末十年间便创建了一大批新式制瓷企业, 如河南禹州的钧窑瓷厂、江西萍乡的萍乡瓷业公司、福建厦门的华宝制瓷厂、湖南醴陵的醴陵瓷业公司、江西景德镇的江西瓷业公司, 四川泸县的川瓷公司等。值得提出的是, 在这些新式瓷业公司中, 有些公司的创办与近代新式瓷业学堂的创建呈现

收稿日期: 2019-05-16。

修订日期: 2019-08-1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9YJC880105)。

通信联系人: 邢鹏(1982-), 男, 硕士, 讲师。

Received date: 2019-05-16.

Revised date: 2019-08-13.

Correspondent author: XING Peng(1982-), male, Master, Lecturer.

E-mail: 634259685@qq.com

出一种共生相伴、互为表里的关系，其中湖南醴陵瓷业公司与湖南醴陵瓷业学堂便是我国近代瓷业发展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一对。二者为近代醴陵乃至我国陶瓷产业及其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尤其是其创下五彩的惊艳问世，不仅有效地奠定了醴陵瓷业在我国业界的声望与地位，同时也为我国近代瓷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在此之前醴陵瓷业可谓乏善可陈，据史料记载醴陵制瓷业源于清初，且以粗瓷为主供给当地民众使用^[1]。那么在近代社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醴陵瓷业是如何实现自身的华丽转身并实现了转轨超车呢？在这一过程中醴陵瓷业与其教育实现了怎样的历史互动互助？

1 近代醴陵瓷业自适应发展特征

据民国学者文斐所著的《醴陵瓷业考》记载：“清初，广东兴宁人廖仲威在醴陵汾山发现瓷矿，雍正7年，廖氏向汾山寺僧赁山采泥，创设瓷厂，并约同乡技工廖、曾、马、陶、樊等20余人前来汾山共同组织制瓷生产，同时面向当地居民招工传习，遂成为醴陵瓷业之嚆矢”^[2]。随后该地的土瓷产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至十九世纪末，醴陵全县土瓷厂近500家，窑口200余座，产品远销湖北、四川等地。随着五口通商口岸的被迫开放，西方列强的压榨方式开始由赤裸裸的武装掠夺转为较隐蔽的经济剥削，借助不平等条约将大量的机械制品大肆倾销我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制瓷业普遍受到了毁灭性地打击，就连曾经享誉全球的景德镇瓷业也落得个“日暮穷途”的悲惨局面，此时醴陵的土瓷业一如时人所述“近年来，土货滞销，窑户赔累几至歇业，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3]正待醴陵瓷业危在旦夕之际，早期维新人士熊希龄的出现使得醴陵瓷业峰回路转（见图1），经过熊氏一系列的调研、考察、对比，并结合国际制瓷形势进行分析之后，最终熊氏认为醴陵土瓷业主要存在以下缺点，一是制瓷生产方式因循守旧；二是民间窑户资本不足，难以创新；三是采取瓷土毫无规则且工序简略，四是釉料及造画粗劣等^[4]。

基于该地瓷业的现状，熊氏开出了“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的振兴醴陵瓷业之战略药方，此方案提出后即刻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在熊氏的引导和带动下，湖南醴陵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乘势而生，当时的醴陵瓷业学堂仿效日本而建，故设模型、辘轳、陶画三科（见图2），



图1 熊希龄
Fig.1 Xiong Xiling



图2 1907年湖南醴陵瓷业学堂师生合影
Fig.2 Photograph of staff and students at Liling Ceramic School in Hunan in 1907

主要教师亦为日籍人士，如教授陶画的大凡谷里吉、教授原料实验和辘轳的马场梅吉、教授窑务的河原小太郎、教授现代制陶法的安田乙吉等^[5]，在此需要提出的是，当时一名日本教员的工资是本地教员工资的百倍之多。在学堂成立后两年，湖南醴陵瓷业公司按照原计划顺利成立，地址与学校相邻，内部设置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电灯室、化学室等，建设规模宏大，设备齐全且先进，从原料制备到成型加工等生产设备均购于日本，该厂的创建可谓是我国陶瓷工业化建设的起点，同时也是我国制瓷技艺由经验积累向科学研究转变的分水岭。

湖南瓷业公司的创办不仅顺应了世界工业化历史进程的潮流，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人天朝上国、人杰地灵的文化心理，湖南瓷业公司一时成为了社会的焦点，各大媒体相继刊载了湖南新式制瓷业的新闻。值得骄傲的是湖南醴陵瓷业公司不负众望，公司与新式瓷业学堂精诚合作，从制瓷原料分析到颜料成分配比（详见表1、2）。

表 1 醴陵各处制瓷原料实验报告^[6]
Tab.1 Experimental report on ceramic materials from around Liling

性质 产地	正味之性质						残滓之性质
	正味成分	黏力	干燥收缩	烧成收缩	烧成色泽	熔融度	
瓦子山	70%	尚强	10%	15%	甚白	SK18	与正味同
爛泥坡	50%	中	8%	7%	白	SK16	含长石石英小颗粒甚多，熔融度比正味稍低，色极白，无黏力。
西园冲	90%	尚强	10%	15%	白	SK19	与正味同，惟色稍次
王家排	60%	上中	10%	15%	白	SK18	与正味同，惟色稍次
牛形山	70%	上中	10%	15%	白	SK18	与正味同
青泥湾	80%	无	6%	15%	白	SK15	与正味同
蔗塘坪	50%	无	5%	5%	白	SK40	含云母甚多，色比正味次
九都	90%	无	6%	8%	甚白	SK28	与正味同，惟色稍次
板杉铺	90%	无	6%	15%	甚白	SK16	与正味同
冷水坑	90%	极强	10%	5%	白	SK38	含铁甚富，故色甚次

表 2 釉下彩颜料成分分配比表^[7]
Tab. 2 Composition of underglaze enamels

	蓝花色	黑色	褐色	暗褐色	灰色	绿色	叶绿色	暗蓝色	浅蓝色	暗绿色	黄色
氧化钴	30		15			2	1	34	8		
氧化铀		16			8						
氧化锰			10								
氧化铁				15		5					
氧化镍			10								
氧化铝	70	14	25	20	52	50	40	65	60	10	
氧化铬			25	15		10	14			70	
长石			5		20	15	20				
石英		70	10		20	18	25			10	
氧化锌				50					32		40
方解石										10	
金红石											60

直至研制出新品种“釉下五彩瓷”仅仅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釉下五彩瓷研制成功后不久便参加了 1909 年清政府举办的武汉劝业会，并斩获金奖。后又相继参加了南京“南洋劝业会”，获一等奖；意大利“万国制造工艺赛会”，获最优奖；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金牌奖等。在近代我国饱受欺凌的背景下，湖南醴陵瓷业连连获得国内外大奖，着实为国人争了光，一时间，醴陵彩瓷“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堵商贩之来此贩运者络绎不绝”^[8]。至 1914 年，“瓷业公司的厂屋达到 700 余间，分为模型、结辘、制坯、和泥、上彩、普通、专门等共 40 个厂；工人有六七百人，工价视其工作之多寡酌情给之；正式的窑炉有三座，每窑高约丈、宽丈、深丈余，每窑出货价值约一千二三百元，还有两座备用窑炉；烧出的瓷器无瑕疵、精细者，可销往湖南、湖北、江苏、

安徽、山东等省份。”^[9]在湖南瓷业公司的影响下，本地一些开明士绅率先认识到，落后的工艺终究是要被先进的生产力所取代的，于是他们开始就近仿效开办新式瓷厂，如普利制瓷公司、裕华公司、德昌公司等。但好景不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醴陵不仅遭受了两次大的水患害，还承受了护法战争的硝烟之苦，如此一来，醴陵瓷业及其教育便再次陷入了逡巡不前甚至倒闭的尴尬局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局面才得以好转。

近代醴陵瓷业的发展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首先是变轨式发展。该地的制瓷业在时代人物的领导下，将落后的手工土瓷业转型为现代化的机械制瓷业，极大提高了制瓷效率，实现了国内制瓷业的变轨超车。其次是错位式发展。以熊希龄为首的湘籍瓷业改良人士在面对“湖南士绅多喜用洋式杯盘，弃旧尚新，月异而岁不同”^[10]的现

状，综合对比中西瓷器样式、釉色及原料后，认为“西洋之工，虽陶如瓷，中国之工，虽瓷如陶。外国瓷工专在造画造色，而于瓷质上次之；中国瓷工于瓷质上颇知讲求，而造画、造色、造式上次之，正与西法相左，无怪其不能畅销。”^[11]鉴于国内外局势，最终他们在日本技师的帮助下另辟蹊径创烧出了釉下五彩新品种(见图3)，釉下五彩一经推出便得到国内外市场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认可，成功实现了醴陵瓷业的错位发展战略目标。最后是结构式发展。近代醴陵瓷业的发展及辉煌成绩，与其产业结构的布局有着重要的关系，该地不仅从国外引入先进的制瓷机械设备和颜料，还从国外高薪聘请教员、技师，值得称赞的是，他们还前瞻性地创办了新式瓷业学堂，专门培育新式瓷业所需要的技术人才。随着瓷业的发展，还创办了官方主导的“模范窑场”、“窑业实验所”等瓷业研究机构，从而形成了近代醴陵瓷业结构式的发展模式。



图3 湖南瓷业公司作品《花卉》玉壶春瓶
Fig.3 "Flowers", Yuhuchun vase, supplied by Hunan ceramic industrial company

2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创烧及其产业经营理念

釉下彩这一瓷器装饰类型，早在我国唐代铜官窑产品中就已经得到成熟应用，但碍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审美特性，我国釉下彩的发展相对迟缓，自唐朝至清代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是发展出了青花和釉里红两类品种；相反，日本则在进口我国唐代三彩瓷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种类较为丰富的釉下彩瓷。

1906年湖南醴陵瓷业公司成立(见图4)，1908年，湖南瓷业公司在日本技师的指导下，开始试烧釉下彩瓷新品种。新产品研发的过程并非一帆

风顺，据当时瓷业学堂学生回忆“当时能够直接看他(安田乙吉)工作的只有一个叫李仕云的学员，因为要给他做些杂工，才学了一点彩釉配方的技术，其他学员就只能从楼板缝中偷看学艺。”所以湖南醴陵瓷业公司研发釉下彩瓷的主要成员只能由醴陵瓷业学堂毕业生和景德镇的技工组成，他们经过艰苦钻研，最终成功烧制出玛瑙红、海碧、草绿、艳黑、赭色五种高温釉下颜料，并采用“三烧制”工艺，创烧出前所未有的釉下五彩瓷器。另一方面，当时醴陵新式的瓷业公司采用的是机械化为主的生产技术，生产的瓷器不仅质量高，而且产量大，很快便对原有土瓷窑户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便不可避免的引发了新旧窑业从业者之间的矛盾，以至于“该地原有各窑户不自咎其不能改良，反嫉妒新式公司，谓为夺彼生活，群起而与之为难，故数年来，变局环生，困难已极。”^[12]此外，由于当时的瓷业公司和瓷业学堂的骨干技术(教师)均为日本籍技师，自然使得湖南瓷业公司这一时期的产品图案颇受东洋风格的影响，而造型又近似中国传统的类型，致使当地一些民众认为该公司所出产品不伦不类，时常讥讽，称其公司为“洋瓷局”，这一点可以从中日花鸟图案中窥见一斑，如当时瓷业学堂创作的釉下彩瓷作品——《雪松群鸦》直腹瓶(见图5)，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景年画谱》中的“雪松群鸦”图案(见图6)相似度很高，甚至是一种仿摹，这也就难怪时人的调侃了。而其它瓷区则认为“湖南馆陈列醴陵县瓷器几与东洋高等瓷器无所区别”^[13]。

基于上述状况，瓷业公司采取了现代化的企业经营理念。首先是创建品牌。新式瓷业公司领导人是—批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他们敏锐地发



图4 湖南瓷业公司创办时期发行的股票
Fig.4 Stock issued by Hunan ceramic industrial company at its startup



图 5 湖南瓷业公司《雪松群鸦》直腹瓶
Fig.5 “Snow-covered pine tree and flock of crows”,
straight-bellied supplied by Hunan ceramic
industrial compa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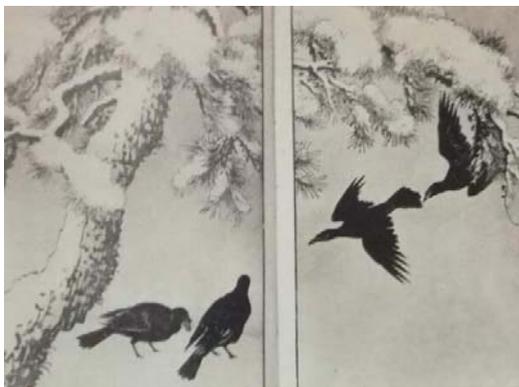


图 6 (日)今尾景年《景年画谱(雪松群鸦)》明治维新时期
Fig.6 “Snow-covered pine tree and flock of vase, crows”, Imao
Keinen, Japanese, Meiji era

现国际上争相举办的工艺赛会、博览会等，这些赛会不仅可以扩大视野、增进交流，还可以展示实力，构建品牌。于是以湖南瓷业公司为首的新式瓷业公司决定采取“以赛促销”的战术，即通过参

加赛会评选，打出名气，创建品牌，打开销路。在公司上下精心筹备下，公司产品先后于“武汉劝业会”、南京“南洋劝业会”、意大利“万国制造工艺赛会”、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等赛会上夺得桂冠(见图 7)。上述赛会优异成绩的取得，不仅证明了新式瓷业公司的实力，更为醴陵釉下五彩品牌的创建与塑造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是构建产销分离的现代化经销模式。品牌创建成功后，为了进一步扩充销售市场，1913 年以瓷业公司为首的新式企业开始在长沙、湘潭、衡阳、益阳、常德、醴陵等处设立承销处，一改传统的产销不分的混合的局面，为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迅速扩张和知名度的快速传播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3 近代醴陵瓷业发展的内在逻辑

近代醴陵瓷业的崛起看似是历史的偶然，实则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首先是源于近代社会转型和政府深化改革的需要。近代以来，我国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样态，被西方强硬地拖进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转型时代。这是一个以人的全面觉醒和人权平等为标志，以商品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全新时代，这种新式文明一经引入，便对我国古代以差序为基础的原有文明社会样态造成了极大挑战，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成为了历史的必然。从“历史大趋势看，所有的国家都企图脱离以农业经验为主的管制方式，采取重商主义的办法，最后之目的在使全国接近世界标准。”^[14]也就是说，在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步伐不可遏止的情况下，发展工商业，并使之与世界接轨是当时政府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因此，醴陵瓷业的发展就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图 7 1915 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牌
Fig.7 Gold medals of the 1915 Panama 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in San Francisco, USA

其次是因为近代湖南士绅群体的崛起与湖湘文化的再塑。湖南自古就有民风强悍，士风卓厉的文化基因，到了近代，这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基因呈现出放射状的发展态势，以至于形成了“无湘不成军”、“督抚半湘人”等近代社会现象。甲午战后，在强烈的民族危机刺激下，大批的湖南热血青年为了救亡主动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央。据统计，鸦片战争以前，湖南人才在全国所占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而在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八十年间，湖南涌现出的人才则占了全国的百分之十左右，更为重要的是，近代湖南形成一股“经世致用的风气，使湖南士人不仅十分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并且积极投身到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中。”^[15]他们身上所展现的忧国忧民、经世致用、自强不息、崇尚实学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湖南乃至中国近代社会的革新与发展。

第三是发于近代国内瓷业危局背景下醴陵窑工的变革心声。《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得洋人对我国的经济侵略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根据“条约”可以在中国办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与廉价的劳动力，将机械制造出来的货品大量运入中国内地，这就使中国瓷器手工业受到了严重打击，洋瓷进入内地倾销，只征收象征性的所谓“合法税捐”。而国瓷销售，则要“逢关纳税，过卡抽厘”，加上税吏的敲诈勒索等，中国瓷器国内外市场低迷是必然现象。取而代之的则是以日本、英国为首的洋瓷大肆倾销国内，“凡京、津、沪、汉以及各繁荣商埠，无不为东洋瓷之尾闾”^[16]，倾巢之下，醴陵土瓷业亦备受打击。面对洋人的横行和洋瓷的倾销，饱受欺凌的国人们的爱国理性逐渐回归，在瓷业方面开始由被动消极的对抗改为积极主动的革新。所以当熊希龄与文俊铎等革新人士向当地窑户工人宣布醴陵瓷业必须改良时，即刻得到了众人的“围观延揽，络绎于途，鼓舞同声”的欢迎。

最后是基于政府支持下的吏绅民商间的均利行为。基于清末特殊的国情，清末湖南几任督抚均注重当地实业的发展，当熊希龄在呈交《熊希龄为湘省创兴实业推广实业学堂办法上端方书》和《熊希龄为创兴醴陵瓷业呈端方文》后(见图8)，端方随即便接纳了熊希龄的建议，并许之“次第进行”，还拨借善后银库官款18000两，作为新式瓷业发展的启动经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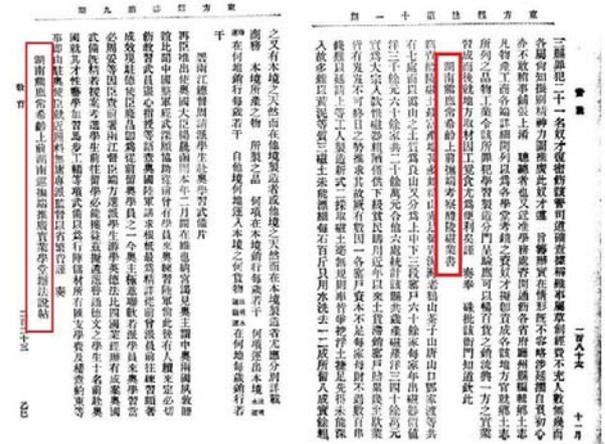


图8 熊希龄关于振兴醴陵瓷业的建议，分载于1905年东方杂志第9、11期

Fig.8 Xiong Xiling's proposal for rejuvenating Liling ceramic industry (The eastern miscellany, 1905, 9+11)

此外，清廷通过学部发政府行文“湖南瓷业学堂办理有效，各省有窑业地方皆宜设法提倡”^[17]，并札商务局分别移行文。由此不难看出，醴陵新式瓷业迅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除了政府的有力支持，吏绅民之间的紧密合作是该处瓷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湖南维新知识分子皮锡瑞云：“近日湖南风气又为各省之最，是由地气变得益盛，亦由乡先贤之善变也。”^[18]1904年9月熊希龄在端方的授命下考察日本的教育和实业，归国后便将考查报告即刻呈交给了湘抚端方，文中建议在湖南急宜创建“数百万人民所托命之源”的“徒弟、染织、农林、陶器”等实业，在本着“近夫因民之利而利，较易设法改良”的原则，随后在醴陵人士文俊铎的建议下，他们共同决定改良醴陵土瓷业。所以近代醴陵瓷业的发展，不仅符合国家政府的需要，亦顺应了基层窑业从业者的呼声，是一场政府支持下的吏绅民商间的均利行为。

4 近代醴陵瓷业的产教融合模式建构

近代醴陵瓷业的发展一度引领了我国工业化制瓷的潮流，而近代醴陵瓷业教育则开创了我国瓷业教育学校模式发展的先河。表面上看，二者几乎同时期诞生于同一个地域，在运营管理上实行的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是较为典型的产教一体模式。该模式一经施行，便发挥了其卓越的性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为我国瓷业及其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极为有益的尝试与践行，意义深远。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该产教融合模式的成功建构还存有如下三方面的内在逻辑。

首先是“苟欲兴工必先兴学”^[17]的瓷业与教育次第发展关系。近代醴陵瓷业之所以比国内其它产区率先崛起，并在新型瓷业公司成立后不久便研制出举世瞩目的醴陵釉下五彩瓷，从而一举奠定了醴陵瓷业在我国瓷业发展史中的地位，其中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率先采用了苟欲兴工必先兴学的瓷业发展理念，该理念早在戊戌变法前张謇等人在创办大生纱厂时便进行了实践性的探索。而熊希龄与张謇曾均为改良派干将，他们的改良主张自然意趣相投，所以张謇创办实业和教育的模式及经验优先被熊希龄借鉴到醴陵瓷业发展上来。这种模式的优点主要有二，其一，先学堂而后公司，公司创办和运营所需要的新式技术和管理人才，在当时中国是没有的，所以很多新式瓷业公司采取了聘请“洋教习”来传授机械制瓷技术和管理公司，如此一来，公司在“洋教习”高额薪金及其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下，导致很多新式瓷业公司开局不利，甚至出现亏损局面。而先学堂后公司则有效地化解了上述问题。其二，先学堂而后公司，公司所需的新型人才成为学堂人才培养的直接目标，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不仅可以高效地整合社会力量参与办学，而且还有效地组织和调动学校内部的教学力量和热情，从而有效促进学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其次是“厂校合一”的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关系。近代“厂校合一”的办学模式亦非醴陵瓷业首创，早在洋务运动时期，福州船政学堂便采用了该种模式。但在瓷业方面，该地则率先开启我国瓷业发展“厂校合一”的新模式，在该模式的影响和带动下，国内其它主要产瓷区纷纷开启了这种瓷业发展模式，如江西瓷业公司与中国陶业学堂，高州府瓷厂与高州府瓷业学堂等。这种模式的应用不仅是我国瓷业先贤智慧的体现，也是时代的应然选择。首先，这种模式有利于公司精简和压缩运营成本，如公司新产品的原料及研发等费用，“去岁……瓷业学堂已制成试验品多件，呈各衙门局所考验，均获赞赏”^[18]，如此一来该模式则将这部分研发经费无形地转嫁至政府，或者说是纳税人身上，可谓取之于无形，使得公司运营成本降低，有效增强了其产品竞争力。其次，该模式双赢的另一面则是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厂校一家的便利条件，不仅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新式机械制瓷过程，而且还可以采取“见习”、“顶岗实习”等方式参与到实际的生产中来，进而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极大地

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后是“休戚与共”的产业共同体关系。新式瓷业公司与新式瓷业教育均是伴着传统制瓷业采用工业化的生产模式而出现的，所以，新式瓷业公司与新式瓷业教育是新式陶瓷产业发展的两翼，二者为同根同源的关系。近代醴陵瓷业一经改良便在国内诸多代表性赛会上斩获头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佳绩，其中釉下五彩新产品的创烧就是瓷业学堂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产品的批量生产和推广则有赖于公司的运营，这就有力地证明了荣誉的取得是二者通力合作的结果。后来随着湖南醴陵瓷业学堂永久班(学堂里仅设艺徒班)被拆分至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继续学习后，公司的管理及研发水平日趋低下，加之民国早期自然灾害和战争灾难的双重打击，最终近代醴陵瓷业和教育在内无“大将”外有“强敌”的境遇下惨淡经营至民国中期无奈而止。

5 结论

近代醴陵瓷业的发展及其教育的率先创办，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呼应了时代改革的浪潮，体现了地方实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反映了广大手工业从业者的心声，该地瓷业的发展可谓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成绩。首先，釉下五彩开创了我国瓷器装饰新类别，醴陵瓷业学堂开创了我国近代新式陶瓷教育的先河，二者一度曾引领了我国近代陶瓷行业发展的潮流，尤其是该瓷业公司与瓷业学堂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厂校合一”模式，为我国近代其他陶瓷产区的产业和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贵的时代样本，有力的推动了我国陶瓷产业的工业化和科技化，同时也为其它行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参照物”。其次，直接有效的促进了湖南醴陵地方瓷业的改进与发展，该地釉下五彩的成功创烧，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醴陵釉下五彩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我国陶瓷艺术种类，而且还奠定了醴陵瓷在我国瓷业中的地位。最后，近代醴陵瓷业的发展在我国得以率先成功的历史原因是“国家情怀和均利思想”，吏绅有了国家情怀，各项利民政策才会真正“落地”，士绅有了“国家情怀”，各项建议方案才会真正体现民生之诉求，绅商有了“国家情怀”，产业反哺教育的设想才会落到实处；而均利思想则是对国家情怀的进一步深化和升华，这是因为人不仅是社会中人，而且还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个

体,所以均利思想不仅可以维护士绅民商各界人士的基本利益,而且还可以使其获得相应的社会尊重和认可,故而各方积极性才会得到充分的发挥,这种思想对于当下校企合作,官产学研合作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李石静. 醴陵之瓷业[N]. 湖南经济, 1947(02): 157.
- [2] 文斐, 醴陵瓷业考[J]. 载于刘谦编撰《醴陵县志》[M]. 醴陵县文献委员会排印本, 1948.
- [3] 熊希龄为创兴醴陵瓷业呈端方文[N]. 长沙日报, 1905-06-15.
- [4] 汪向荣. 日本教习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87.
- [5] 沈明扬. 实用陶瓷颜料学[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68.
- [6] 沈明煦. 醴陵造磁各处原料之试验报告[A]. 实业杂志, 1913: 11.
- [7] 陈真编. 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3辑[M]. 北京: 三联书店, 1961.
- [8] 孟幼庵. 醴陵瓷业工厂调查记[A]. 见陈真编. 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3辑[M]. 北京: 三联书店, 1961: 356.
- [9] 熊希龄为湘省创兴实业推广实业学堂办法上端方书[N]. 上海时报, 1905-06-09.
- [10] 田申. 醴陵瓷[M].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0.
- [11] 宣时雨. 各馆之瓷器 [A]. 见: 鲍永安主编. 南洋劝业会报告[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 [12]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41.
- [13] 王兴国. 略论近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特点[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 [14] 向焯. 景德镇陶业纪事[Z]. 见: 熊寥, 熊微编著《中国陶瓷古籍集成》[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6.
- [15] 《抚辕批示汇录》[N]. 湖南官报, 1904-4-22(第631号).
- [16] (清)皮锡瑞. 师伏堂未刊日记[N]. 见湖南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湖南历史资料》[M].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9.
- [17] 曹从坡, 杨桐. 张謇全集(第四卷)[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 [18] 醴陵瓷业之发达[N]. 申报. 1906 第12032号 P4.